

广州：文化与生活方式丛书

广州的空间辐射

GUANGZHOU DE KONGJIAN FUSHE

李大华 周翠玲 编著

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谁引导了广州的文化潮流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文化与生活方式丛书

广州的空间辐射

GUANGZHOU OF SPACE RADIATION

李大华 周翠玲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的空间辐射/李大华, 周翠玲编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 6
(广州: 文化与生活方式丛书)
ISBN 978 - 7 - 306 - 03096 - 2

I. 广… II. ①李… ②周… III. 改革开放—历史—广州市 IV. D619. 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5781 号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阮 继

责任编辑: 元 阜

装帧设计: 古 晓

责任校对: 伟 伟

责任技编: 潘 隆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6.5 印张 174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代序)	1
一、市场：优化配置与竞争	4
▶ “放”：放给市场一条出路	5
从“商品经济”讨论中探索市场	5
从“菜篮子工程”启程开放市场	7
从承受变通中检验市场	10
▶ “活”：由市场生发的城市生机	12
多元化、多功能的流通	12
市场通 城市活	15
大市场的相生相荣	17
▶ 无形的市场：作为生活品质的衡量标准	19
“一切均可购买”的生活	19
当选择变成权利	20
观念：市场的无形资产	23
二、南大门：向一切梦想敞开	26
▶ 空间转换与自由流动	27
从“英雄莫问出处”说起	27
“民工潮”岂止是劳动力浪潮	31
共饮珠江水	34
▶ 站在中国看世界的平台	38
人才：最高价值的商品	38
广州新名片：留交会成智力广交会	40
人比项目重要 观念比技术重要	43
▶ 梦想是现实的大门	45
广州户口：梦想与机会	45
关于“人才不设防”战略	47

人才运作新思维

50

三、在借船出海中扬自己的帆

53

■ 外资：与开放同名

54

承接着对外开放的传统

54

乘潮而来的“三来一补”

56

外资与广州的产业结构

59

■ 从港资先行到大合作时代

62

港资的试水与启示

62

外资与自我发展的互动

65

以合作为主题的粤港澳前景

66

■ 外资与一个更开放的城市

68

“地球村”景象

68

集资建房的启程

70

时尚生活从超市开始

74

四、在职业、事业、饭碗中实现转换

79

■ 从俚语的创造与变身开始

80

关于“饭碗”的旧词新语

80

有始无终的“炒更”

81

双向“炒鱿鱼”

83

■ 在不确定的饭碗中确定自我

84

人往高处走：社会大流动

84

劳动力流动中的城乡关系

88

世上只有两份工：做老板或者打工

90

■ 现代的职场与活法

93

职业崇尚大变迁

93

职业与活法

95

“孔雀”依然“东南飞”

97

后记

100

■

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谁引导了广州的文化潮流？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代序）

不管存在着多么纷呈的看法，也不管理论的探讨是否已经有了一个明晰的结果，广州人领潮流之先的生活方式已经被人们竞相效仿。近 20 年来，全国各地无数人对广州的选择，其实就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而也就是对一种文化模式的选择。正如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的生活方式就是城市的文化模式。

显然，作为 2000 多年的历史名城，广州的魅力和气质并不呈现在历史上的三朝十帝的皇家气象上，也不规范在森然的礼仪典章里，而是体现于一系列的矛盾组合中：广州人的务实、低调、乐天悠然与“饮头啖汤”的开拓精神；广州的边缘性、非主流性与作为近代中国一度的政治中心与外贸中心的地位；广州社会的现代性与民间传统的“古风犹存”……种种矛盾的因素和谐地并存着，使广州社会在扑朔迷离中异彩纷呈。

历史上，这一扑朔迷离中的异彩纷呈也正是岭南的特征。“九死南荒吾不悔，斯行奇绝冠平生”，如果这句诗不是被贬谪岭南的北宋大诗人苏东坡表达的浪漫和豪迈，至少也算是对岭南山川奇胜所抒发的欣赏态度。确实，在北国人看来，自五岭逶迤以南，满目便是奇异的风土，充耳是呕哑的粤音，往来交接的是蛮荒的习俗。于是，南来的人多半会有去国怀乡的零落之感、孤篷万里的身世之悲，而真的久居下来了，却又像老马恋栈，尽管未“日啖荔枝三百颗”，也分明愿意“不辞长作岭南人”。实际上，岭南的偏隅不仅使它成为在中原以外的一方奇异乐土，而且成为了一个不易破解的矛盾的组合：既是瘴气蛮烟之地，又是物产丰饶的宝国；既是“蛮语”难越的边陲，又是张眼看世界的窗口。在政治命运和革命历史进程的选择中，一方面，岭南远离中国儒家伦理政治的中心；另一方面，在近代，却又责无旁贷地成为了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更成为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的前驱。

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岭南文化”随着岭南社会在近 20 年

间的变化发展，逐渐成为了学术研究中的“显学”，与各种地域文化相提并论。但在对岭南地域文化的研究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共识就是文化方式的“平民性”——渗透在茶香花香中的点点滴滴。

文化是依人而言的。在这里，人创造了文化，同时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从文化是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总和的最基本的定义出发，广州文化就是广州的复合的生活方式而已。

在这一复合的生活方式中，敢为人先、先行一步不仅是广州人最重要、最突出的精神品质，而且是最引人注目的行为特征。从历史到今天，这一精神引领着广州人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创造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而且，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开放的广州对人的尊重与包容、对生命自由的追求的精神内核，最适宜文化的创造与共享和人们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与其认为文化是一种理论指导，倒不如说，文化是广州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的品质追求、工商活动的展开以及城中人的故事都可看做是“文化”的体现与传承。认识广州以及广州人，一切文化解释系统都不及生活方式来得彻底和全面。

本丛书旨在把“文化”从理论框架与抽象的描述中进行具体的还原，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角度揭示广州城市以及广州人的独特的价值观、文化精神以及审美趋向等。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文化被创造与享用的过程，更强调文化深入生活的各种细节与层次。它将层峦叠嶂地体现广州社会无与伦比的丰富性。故本丛书以如下的题目为宗旨：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谁引导了广州的文化潮流？

本丛书不进行理论抽象，而选择一批领潮流之先的“行业”现象作为载体，阐释广州的独步时代的必然性——也说明广州的被仿效，实际上是人们对自主、多元、个性化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尊重。

第一卷以《广州的深度组合》为题，选择了会展业、报业、居住革命文化以及娱乐文化作为切入话题。

第二卷《广州在期待解释》、第三卷《广州的主题生活》分别展示广州的精致丰富与追求卓越的品质。第四册《广州的空间辐射》是对广州社会影响力延伸的讨论。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学者总结了广州文化的三个特

点：平民的而非精英的，本土的而非外来的，未完成的而非固定的。这样的阐释现在看来依然是恰当的。以下借用《南方都市报》对广州城市精神的解释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并作结本序文。

我们坚持认为，广州的城市精神需要重新叙说。这种叙说的目的不是停留在“如数家珍”的层面上，更不是为了制造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自恋，而是指向一种城市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往习以为常的所谓“平民精神”、“实用主义”乃至对于“岭南文化”的褊狭理解，在这里都要重新受到质疑。比如在广州“土著”潘达微身上，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广州精神的另一面。他既是勇敢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先锋艺术家；既是一位社会慈善家，同时又是一位看破红尘的出家人。凭着他的才能，他完全可以建功立业（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艺术方面），但他却淡泊名利，毅然斩断尘缘。强烈的世俗关怀与超验的宗教情愫、宏大的社会理想与细微的艺术感受，竟然能如此天衣无缝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这个以自身生命的丰盈而超越了世俗归类、无法定义的人物身上，可能恰恰体现了广州文化失传已久的精髓。（《南方都市报》2003年3月3日）

我们期望在日常中体察广州，在体察中发现潮流因我们而改变。



一、市场：优化配置与竞争

广州改革开放的成就，与其独特的地域优势与文化背景有关，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当代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在广州这块商业沃土上结出的繁花硕果。

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把竞争机制带到了广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资源产生了优化组合，一系列观念和意识的变化效应也随之显现：时间观念的校正与对效益观念的追求、民主观念的崇尚与实惠观念的泛用、自主意识的强化和诚信意识的复苏……不断地激发出广州人对更高层次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和谐社会的理想期望。



“放”：放给市场一条出路

广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经历了近 30 个年头，考察其过往，把我们再次推向了对几个问题的拷问：当代广东的市场奇迹是如何产生的？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从这里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中国城市生活资料供给体制的历史是如何在这里终结的？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作为“先锋角色”，承担着“经济上探险、政治上探路”的艰难使命。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先走一步”所取得的机制和体制上的优势，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发育早，市场开拓力、辐射力较强，市场机制的作用比较充分。

“放”是广东改革的最大特色。通过“放”引进市场机制，打破封闭、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从这里出发，继而引发了社会的其他一系列变迁。从对市场体制的改革来看，广东改革走过的是一条“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路子。“放”意味着“放权”、“放活”、“放开”。“放”具体而言，就是要把一种商品、一个行业、一套运作方式，从计划经济的框架下转移给市场经济，就是使计划经济的法则、观念，让路给市场经济的法则、观念。

从“商品经济”讨论中探索市场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著名经济学家卓炯、孙儒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以不惧跨越“雷池禁区”的智慧和胆量，为商品经济正名、呐喊，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

“放”意味着“放权”、“放活”、“放开”。

链接：

上世纪 60 年代，经济学家卓炯就提出：“在公有制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6 页）他还多次申明：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因为客观上不存在“没有市场”的商品交换、商品生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观点受到了激烈的批判。直至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仍坚持从理论高度进行思考和探索，反复论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宏观作用与微观作用，提出



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漫长而曲折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认识，并陆续出版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经济学新探》等专著。

这是一次关于“市场经济”的大讨论，更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创新活动。由此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

链接：

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在商品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规律是价值规律；而在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同样是基本规律。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什么差异。然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各自表述的对象又存在着区别：商品经济是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采取价值生产形式，特征在于劳动转化为价值，商品可以买卖；市场经济是指社会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方式，特征在于以市场机制

论先驱，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路先锋”。（曾牧野：《市场经济是条不平坦之路》，《广州日报》2006年3月7日）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被称作广东经济学界的一个优长学科，也是广东经济学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具开创意义的一大探索。

关于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被当做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经济现象来理解的，是广东理论界超越了传统理论和观念的先行一步，从理论上提出了对市场经济的新认识。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实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予以肯定。

1988年月，广东经济理论界在广州举行了每两个月一次的以市场经济为主题的系列研讨活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系列研讨会”，活动持续了一年。这是一次关于“市场经济”的大讨论，更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创新活动。由此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

这一观念的提出，其实来源于此前一系列的思考。从1982至1984年，广州经济理论界就在一系列的研讨会上，提出过相关观念：“从产品经济转变到商品经济”、“广州应发展成为国际性商业城市”、“要适应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需要”等，并认为要实行流通体制的改革。

这些是具有超前探索意义的理论成果。这种市场意识的超前，对形成社会舆论，推动改革实践，发挥了启示性的指导作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决议精神中，广州理论界又进一步提出了“在开放地区建立新的经济模式应该以‘国际市场的导向’，‘建立开放型的市场体系’，‘价格逐步接近国际市场’”等观点（陈雄：《广州市场发育快的动因》，《广州研究》1988年第8期），体现出广东理论界注重实践、关注热点，将学术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学术精神。广东理论界由于亲历了广东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能在理论研究上挑战传统观念，将理论及其原则世俗化并推向了实践。正如一些评论所言：“‘世俗’，恰恰是广东学术

的一根主线，贯穿于广东学术活动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体现在广东学术的成果与影响之中。”（董玉整等著：《春华秋实：广东人的学术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从对市场经济的观念探讨与建立中可见，广东理论界不盲目崇尚理论，但尊重理论。

从“菜篮子工程”启程开放市场

1988年广东经济理论界举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大讨论，引起了国内强烈的反响。当研讨活动的论文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出版后，就有言词尖锐的指责：广东公开出书主张搞市场经济，就是公开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子。但当时社会的共识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走一步，实际上就是要在市场经济改革上先走一步。

“市场”是与改革开放并行的词语，但广州人对市场的熟识并不是从词语开始的，而是从可见的一切实践开始的。他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的思考与分辨，首先是从最切身的事物变化开始的。

来组织和分配生产要素及社会收入。前者的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后者只是市场覆盖全社会，其‘计划’也只是对市场要求的引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表现。”（广东省“市场经济研讨会”编辑组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走一步，实际上就是要在市场经济改革上先走一步。

“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全国一样，广州的商业遭受严重的破坏，商品紧缺，“吃饭难、做衣难、理发难、住店难”。这对历史上著名的商埠的居民广州市人来说，感受更为痛切。

“凉菜（西洋菜）长成白须公，通菜好似一条龙，芥蓝多渣芋头爽，白菜烂头又多虫。”这一民谣正是当时广州市场商品质量的写照。正是这种状况，激发了百姓对生活的最大愿望。另一民谣表达其生活愿望道：

食饭有啲送（菜）、困觉（睡觉）有啲风、企（站）在车上有啲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广州还有一首顺口溜，唱的是“广州三件宝，司机、医生、猪肉佬”。这是当时民声的直接反映，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司机、医生、猪肉佬之所以成为当时人们择业选偶的热点，其原因无非是司机出门用车方便，跑长途还可顺便捎带一些农副产品；医生掌握着开列病假单的权力；而猪肉佬就有肉刀一挥之下人情大送的便利。这些全都与民生息息相关。与

链接：

当时凭票买鱼供应的标准是：每人每个月配给2角钱的鱼票，按一斤鱼4~5角钱计，一个月下来还不够买半斤鱼。鱿鱼等海鲜就更难了。买鱿鱼干要用特殊的海味票，只在每年春节供应一次，5角一斤。



1954年9月全国实行凭布票限量供应棉布



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

民生紧密联系的还有作为那个经济短缺年代的伴生物——票证。从粮油煤、鱼肉蛋，到布匹、火柴、香烟和铁钉，凭票供应的商品共计有60多种。从上世纪5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票证一度在国内市场流通，以替代货币的部分职能，它由此也见证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民生状况。

在封闭式僵化的体制下，这一切是广州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经历。为了让市民摆脱商品短缺的梦魇，广州市政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广州人的“菜篮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州市委、市政府甚至开过几次有关蔬菜问题的全市万人干部大会，以致“广州菜委”曾成为广州市委的美称。但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这一切的愿望和努力都无法实现。

1978年8月，广州人以头一个吃螃蟹的勇气，挑战蔬菜统购包销制度：把过去沿袭了20多年的蔬菜购销由国家定价改为购销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议价成交。议价成交作为市场经济方式的一个突破，为全面引入市场机制奠定了基础。由此，广州人把市场经济机制引入到流通领域。

自1979年起广州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首先从流通体制改革入手，由关系百姓民生的“菜篮子工程”做起，敞开城门、疏通流通渠道、放活价格，终于使货畅其流。

1978年12月，广州市率先改革水产品流通体制，开放部分水产品市场，在全国同行业中办起第一间行栏货栈——广州市河鲜货栈，对河鲜杂鱼实行自由购销，随行就市，议价成交；开放咸鱼、海味、塘鱼、冰鲜鱼市场，采取从逐步开放品种和价格到全面开放的政策，实行“一保二活”，即保证牌价水产品供应，搞活议价水产品。广州的实践，为全国水产、全市农副产品生产流通领域的改革闯出一条新路，成为全国率先改革水产品流通体制的城市。1983年水产总销量达8.29万吨。广州成为全国第一

议价成交作为市场经济方式的一个突破，为全面引入市场机制奠定了基础。由此，广州人把市场经济机制引入到流通领域。

在全国同行业中办起第一间行栏货栈——广州市河鲜货栈。

个成功解决吃鱼难的大城市。全国 18 个大中城市，广州吃鱼最多，价格最便宜。（数据来源：《广州市志·水产志》）

1983 年广州对郊县的塘鱼和鲜蛋大部分实现了议购议销，市场调节部分约占当时上市量的三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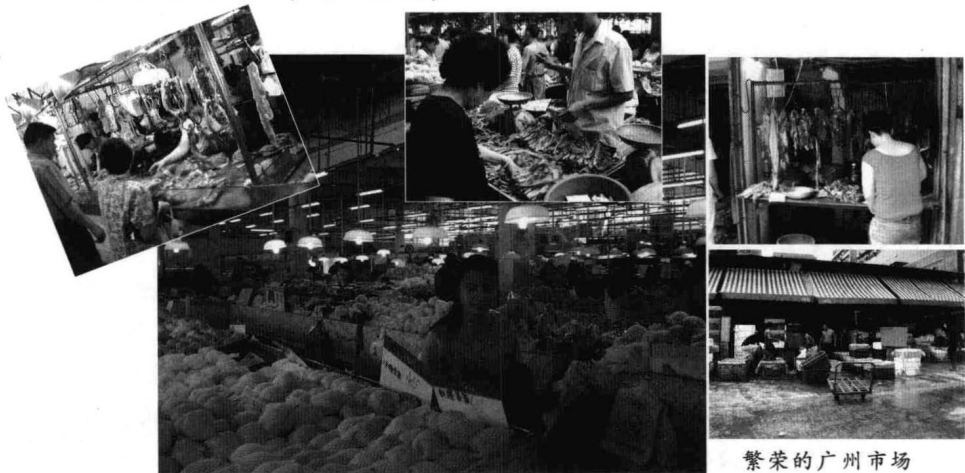
1984 年，广州市政府积极推进和部署有关全面放开蔬菜产销政策的实施，主要包括：对全部上市蔬菜采取不限价，不包购，不补贴的政策；菜价随行就市，议价成交；结束国营蔬菜公司的独家经营，允许集体、个体经营者进入蔬菜流通领域。

畅旺流通，本质就是从“统”转变为“放”，品种、销售、价格由生产者与市场直接联系。这一改革为后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农副产品购销制度改革起到了引导、促进和示范作用。市场“无形之手”终于起作用了。

1984 年，全部放开所有日用小商品价格；1986 年，全国放开 7 种工业品消费价格，广州也结束了高档日用工业品凭票证供应的历史。

1992 年，广州全面放开了粮油价格，“结果是放开一片活一片，‘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在广州从此一发不可收止……1992 年，流通环节中计划体制在广州的最后—块大堡垒——粮食统购统销也被彻底放开经营，广州名副其实地成了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步子迈得最大、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城市”。（杨春南：《南中国的昭示》，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5 页）

广州名副其实地成了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步子迈得最大、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城市。



繁荣的广州市场

而另一深入民心的改革大动作，就是市领导亲自主持了广州“菜篮子工程千家谈”活动，把一个政府的决策交给民间讨论，这也是改革顺利进行的一大经验。“千家谈”就菜贩入室摆卖、纠正市场无序经营等问题广集意见，使广州的“菜篮子工程”总体规划成为群策群力的成果。

这个关系着民生大计的“菜篮子工程”一直延续了20多年，事实上为其他改革举措提供了案例与开辟了道路。这个工程既是一次体制上的改革，更是一次观念上的转变。

让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让政府“看得见的手”实现调控，在经济杠杆的运用下，政府实施着“有为而治”；政府行为与市场经济轨道的相结合，保证了市场经济在广州的健康发展。这一工程在创造城市活力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奠定了广州作为全国市场经济改革领跑者和风向标的地位。

从承受变通中检验市场

对于市场，广州人似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把握能力。由于广州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商埠，在长期的商业机制与商业运作的氛围中，市场的磨砺使他们具有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平等交易的意识和优胜劣汰的意识；同时，广州又毗邻港澳，受港澳市场经济的影响，具有对于竞争的把握、对于财富的追求能力。他们对于探索中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不但有着强烈的认同意识，而且参与其中；他们在承受改革带来的触动与变化的同时，积极应变。

广东以市场经济的方式首创了“以桥养桥”、“以路养路”、“以电养电”、“以港口养港口”等经营模式。

自上世纪80年代流通体制改革开始，广州市政府已经开始运用宏观经济手段调节市场，让市场自我生长。如对农副产品市场的开放过程，采取的是“放中有管，条件成熟，全面开放”的措施，具体是根据广州市的实际与农副产品种类的供求特点，先后有序、口子大小不一地逐步开放市场；在市场开放之初，实行价格“双轨制”，即计划内的农副产品实行“牌价”销售，计划外的进行议价或者以市价推向市场。

对于市场，广州人似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把握能力。

对于长期僵化的价格体制来说，“先后有序”与“双轨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是稳定与开放的保证。“双轨制”从1979年开始出现，到1985年上半年基本取消，其搞活了流通、繁荣了市场、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

但由于改革没有先例可循，广州的每一个改革举措的实施，都引起各种关注，也引发了赞许、鼓励、怀疑、担心等各种态度。如广州蔬菜市场放开后，菜价一度出现了攀升，其时，广州市领导坚定表示：改革不走回头路，果断决定花大本钱建设决定着民生大计的“菜篮子”工程，并且以多元化的方式实施：采取行政手段确立蔬菜基地的保护区。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一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控制乱收费、乱涨价、哄抬物价；另一方面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平抑物价，终于形成了“微观放得开，中观搞得活，宏观管得住”的局面。

价格与市场息息相关。最能体现广州人市场承受力的一个方面就是市民对物价涨落的那种坦然心态。价格改革在广州经济体制诸项政策中是成效较为显著的。作为市场开放标志的塘鱼价格也经历了放—活—贵—多—降—稳的反复。广州是鱼米之乡，却没有鱼吃。1982年春，市委决定全面放开塘鱼价格，一下子鱼价涨了几倍，群众反应强烈并告到中央。但广东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忍此阵痛。结果调动了渔民的积极性，生产增加了。3年之后，全国18个大中城市中，广州人吃鱼最多，价格最便宜。

价格与市场息息相关，最能体现广州人市场承受力的一个方面就是市民对物价涨落的那种坦然心态。

市场开放由塘鱼价格放开作为标志



■链接:

据有关统计显示, 1985年末广州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593元, 为1978年的6.38倍, 居于上海、北京、天津等十大城市之首; 1986年末储蓄余额又比上年增加36.26%, 外币存款也大大多于其他城市。从1979年至1986年, 广州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年均增长率陡升至20.9%, 其中“六五”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9.95%, 既高于全国(14.98%), 也高出国内其他主要大城市4~7个百分点, 在全国遥遥领先。同时,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26.2%上升至1986年的46.7%。其中1985年占45%, 高出同年国内主要大城市5~25个百分点。

■链接:

英国经济学家K. J. 巴顿认为: “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空间地区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 ([英] K. J. 巴顿: 《城市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14页)

放开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要求, 只有放开价格, 价值规律才能发挥作用; 也只有放开价格, 让价格市场化, 才能彻底改变旧的封闭的价格体系, 建立起新的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

物价波动的现实, 也激发了广州人的应变能力。其中, “炒更”就是在改革中出现的新现象。通过“炒更”, 通过从事第二职业、自我创业等开辟新的收入来源。因此, 在市场经济建立中出现的一波一波的物价波动, 并没有给广州社会带来冲击, 反而充分体现了广州市民具有的较为成熟的市场意识。此外, 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改革开放使市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工资总额与消费支出同步增长, 这是广州市场发育的有利基础。

▶ “活”: 由市场生发的城市生机

市场是城市经济的重要元素, 而城市又是市场主要的活动空间, 市场与城市有着本质与天然的相互联系。市场孕育了城市, 城市又为市场提供了相应的客观物质条件。由于城市具有生产要素的密集性和高效性等特征, 因此, 只有市场的发育和壮大, 才能在城市实现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的社会大流通。

多元化、多功能的流通

“大市场、大流通、大商业”是上世纪90年代广州流通业的“主旋律”。从商业流通的小市场发展为社会资源置换的大卖场, 这是广州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广州是一个大集市”, 有人这样形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州。实际上, 这正是广州的本色。源远流长的对外贸易港历史, 孕育了广州对于市场的敏感。市集化、商业化、重利、讲实惠, 种种在贸易大港孕育成的重商文化底蕴, 渗透在广州人种种日常生活习俗中。即使在“自由贸易”被视为资本主义毒草的“文革”时期, 集市流通这一交易方式依然在广州悄然地生长着。如老城区“西门口”一带, 就曾经是毛主席像章交换的固定集市。“文革”期间, “逍遥派”出现, 养鱼玩鸽之风盛行, 在广州的泰康路一带, 就形成了鱼市、鸽市。此外还有分散在市内横街窄巷的以农副产品销售为主的自由市场, 也一直有着生命力。